

老昆明
风情录



前言

这本书以浅淡的笔墨，粗略地回忆和记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老昆明城的一些城市风光、街头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道德风尚和一些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作者本人的自身经历和亲自耳闻目睹的事实，翔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生活，为的是能在那老昆明城深长的历史篇章中，涂抹几笔轻淡的素描和零星的真实写照。

至今已时隔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沧桑巨变已使旧时代的一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痕迹逐渐消逝在那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不仅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那旧时代老昆明城的生活多已茫然不知，就连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或许也印象淡漠。希望拙作能对与我同龄的人们，勾起对那旧时代历史辛酸的回忆和品味，而对于中、青年的后生们，能从中知道一些历史变故，从而在建设新昆明的伟业中，追求卓越，更加奋进。

由于个人的阅历有限，所记忆的事实也只能



是零星、片断和不完整的，远不及那茫茫历史沧海中之粟。我信手写来，老朽秃笔，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杨树群

2006年3月25日

时年七十有七



目 录

根	(1)
昆明古城	(5)
明城墙	(7)
城 楼	(10)
街道变迁	(16)
古民宅·民居	(22)
寺宇沧桑	(26)
官衙府署	(30)
飞鸟·流水	(32)
正义路	(37)
文明街	(47)
光华街	(54)
藩台衙门	(59)
金碧路	(66)
熟皮坡	(72)
大东门外	(78)
财盛巷	(85)
四吉堆	(87)
文 庙	(94)
鸣炮与打更	(106)



街 头	(109)
开门倒桶	(112)
井	(114)
唱小曲子	(117)
义勇消防队	(119)
乱堂茶铺	(123)
供 桌	(125)
北河埂	(127)
礼尚往来	(129)
丧葬习俗	(133)
大索行	(138)
猪八碗	(139)
甜浆包子	(141)
清汤羊肉	(143)
华山小学	(145)
海源寺远足	(149)
抗日烽火	(153)
跑警报	(157)
青龙村	(159)
灾难临头	(167)
交三桥惨案目睹记	(169)
冻 尸	(171)
孚佑宫	(174)
山姆大叔	(179)
丁肯堂	(183)
雷 宣	(188)



庄 重	(189)
退街中的骗局	(191)
二十一条命案目击记	(194)
昆明保卫战·义勇自卫队	(197)
龙头村	(204)
松花坝	(209)
小河之旅	(214)



根

我于农历庚午年（公元 1930 年）腊月初八日，出生于昆明市中心文庙横街一个小商人的家里。

那时的昆明城，居住的大多是商人，还有店员、公教人员、手工业者、摊贩以及众多的城市贫民。他们在衣着服饰、语言谈吐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外地州县有所不同，就是与近在咫尺的郊区农民相比较，衣着上也有明显的差异。那时候的昆明人，一般的成年男性，大多衣着青布或蓝布长衫；妇女则多穿长袖或半短袖的旗袍；青、少年则着短打的学生装；而五六十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多数仍保持着清代沿袭的装束，如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衫马褂，用带子系扎裤脚，足穿自制的土布袜子和布底鞋，只不过少了一根辫子；至于老年妇女，则长裤短袄，头戴两片船形状的“帽箍”。他们所操地道的昆明话，在平和轻柔中带几分浊重。而尤为鲜明的是：他们一般都秉性善良，温恭谦和，宽仁厚道，不似边疆山区人民那种刚强豪迈的气质，却有古代中原、江南人民温文尔雅的遗风，亦很少圆滑利索的气息。

人们不禁要问，老昆明人这个特异的社会群落，渊源来自于何处，这时，一些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长者们，就立刻会昂首挺胸、激动而自豪地回答：“我们的祖籍是江南南京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是随明朝沐国公来到



云南的。”

我没去调查过，不知道高石坎、柳树湾究竟在南京何处。只听说，我的一位街邻，也就是晚清云南巨商王炽之后人王天船，于1947年，为了寻根问祖，曾专程到南京作过一番探访，但无结果，无功而返。

1935年，我家族中的长辈们合计着修了一部颇为简略的家谱，名曰：《杨氏世系宗谱》。尽管我的父亲文化并不高，只读了几年私塾，不通四书五经，居然也薰香盥手，为这个家谱写了篇文辞勉为通顺的“序言”，开头便道：“木必有本，而后木可以生。水必有源，而后水可以流，惟人亦然。人必有创始之祖以植基，而后子孙绳之，连绵不已，如松之盛，如川之流焉。明崇祯年间，江南上元孙杨氏开基公宦游滇之昆明，遂家焉……”

按这个家谱的记述，我家族之“植基以创始”之祖名杨开基，江南上元人氏，于明崇祯年间，宦游来滇而安家于昆明，成了这户杨氏的“一世祖”。传至我这一辈，已是第八代，我则被尊称为“八世祖”。至于这位“一世祖”开基公的身世，祖居何地，谋何职业，怎样到了昆明，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楚，家谱中无此记载，族中人也无较为详细的传闻，以致我父亲在家谱序言中也不得不为之叹息道：“其先一世祖者，世次皆不可纪，以迭遭兵燹族谱遗失故也。呜呼！自吾一世祖之前，而吾莫知之下焉已矣！”所幸家谱中尚明确地记载了这位开基公夫妇的墓址，地点在城东郊沐东村后铺烟山（即现今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原址）。我幼时曾随族中长辈到该处扫过几次墓，目睹了这位“一世祖”夫妇的栖息之地。虽然是两座荒凉的土冢，却为这位三百余年前的先人的身世，提供了确凿的见证。还有开基公之系，即三世祖杨显宗夫妇的生卒年月尚



有记载。显宗公出生于雍正九年，即公元 1731 年。由此上推两代，估计开基公的生辰，约在 1620 年左右，为明天启初年，于崇祯末年入滇，是可能的。但当时的开基公，估计只有二十来岁，“宦游”似不可信。开基公所处时代，正逢清军入关，战火纷乱，战事由东南向西南蔓延。开基公作为兵丁士卒，或工匠夫役，或作为遗老遗少，随明残军由江南逐步撤退进入云南，是可能的。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开基公的先祖，早在明初即随沐国公定居昆明，只不过由于迭遭兵燹，族谱遗失，无从考证罢了。

查史料，明朝建国后，沐英镇守云南，汉族戍军、移民随之多批大量入滇。沐除所率本部 13 万兵丁及军属外，并先后携带和移置江南南京、山东、江西等地士民以及中士大姓数十万人入滇，湖广、陕西等地卫所也先后选调士卒 7 万余人入滇屯田；内地卫所凡捕获之逃亡士兵，被官府判刑的获罪人员，也都发配云南充戍。云南地处边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气候宜人，有开发与发展的潜在空间，对广大的江南及中原内地人民，特别是贫苦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据记载，明代，汉族移民来滇，包括驻军、屯民、工匠、谪戍以及经商、为宦的，先后不下三四百万人。我的这位“一世祖”开基公可能也是那时入滇的，但已无据可考。

杨氏家族从 1620 年到 1934 年的 314 年中，共繁衍人口计 76 人（包括配偶在内）。从“一世祖”传至我这一辈已是第八代了，我这一代有 24 人，至今健在的仅存 2 人。先人们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城近郊东、西、北三面近山，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东郊沐东村、官家头、何家院村后的铺烟山、贺大井、倒挂金钩等地，归化寺前后及

附近的金马山、凉亭、黑土凹，西郊的金鼎山、虹山、麻园、黄土坡，北郊的地台寺、商山、莲花池后山一带，都还是一片片起伏连绵的荒山野岭，满山遍野，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座座土冢。不少为明嘉靖、万历、崇祯时期的墓葬，都是昆明先人们的遗迹。而今，这些低山丘陵都已开发扩大成为城市新区。过去的荒山野岭，已被当今繁华的楼市和街区所取代。先民们的遗迹，已很少见了。



昆明古城

昆明是一座历史古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始创于战国时代“庄蹻开滇”时期，至唐朝、南诏时修建为拓东城。到了明代，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座颇为壮丽的砖城。根据记载，城周长九里三分，高二丈九尺二寸。其原址：设定以现今的大东门小花园为起点，北上沿青年路，至圆通山、一窝羊，经螺峰山山腰顺山势蜿蜒盘桓向北伸展，至今北门街尽头，折向西，在距今一二·一大街约一二百米的位置处横贯云南大学，到今文林街尽头新建设电影院口，再折向东南经建设路至小西门，转东风路、南屏街，到达护国桥后又折向北经青年路回归至小花园。也就是说，现今的青年路、圆通山北段、云南大学北段、建设路、东风路中段、南屏街、东风东路西段，这些路段就是明城墙的故址。

城市规模，明代建城时，城市范围大体是：东至盘龙江，南至土桥，西到篆塘，北抵莲花池。至今尚存的遗址有南门外德胜桥、鸡鸣桥、土桥，东门外的敷润桥、交三桥，具体始建时期均为明洪武、天顺、成化年间，说明当时的城市交通，已通达这些地区。这样的城市规模，基本是延续到了清朝和民国两代。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相当于市政府）成立，当时的官方记载，城市范围，东到东庄（即现今的东华），南至螺蛳湾、豆腐营，西至黄土坡，北至莲花池，东南至滇越铁路总车站（现今塘子巷

昆明铁路局)，西南到潘家湾、瓦仓庄，东西广五四里，南北袤六三里，全面积计 17.96 平方里，虽较明代有所扩大，但增加面积亦较有限。20 世纪 40 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虽有所扩大，但步伐和变化还不很大。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不仅紧接交三桥、螺蛳湾、潘家湾、瓦仓庄、塘子巷等界址之外的地方都还是郊区农村的大片农田或菜地，就连属于城界内的桃源街、吹箫巷、王川巷、明通巷、蒲草田、书林街等地都还夹杂保留有小片的稻田、菜圃或茭瓜塘。昆明城市之所以迅速发展扩大到 21 世纪初的今天这样大的规模，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了。

城市的格局，按照清代以至民国以来老昆明人的说法，是按城墙将全城分别区分称呼为城里和城外，一般陌生的老昆明人初次见面，不免都要彼此询问：“您家是住城里还是城外？”在老昆明人的心目中，城里才是主要的居住地，也是居住的安全区。而城外，虽然居住成本较低，交通往来便利，回旋余地也较大，但由于战乱，所承担的风险也较大。据零星记载推断，明代城内多为官衙府署和王公贵族居住，普通居民尚为数较少，尚有不少荒芜土地有待开发。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城内则已逐渐发展成较为繁华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市，绝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开发和建盖成为主要的居民居住区。而城外，特别是南门外，明清两代已发展为商埠之地，到清朝中期以后，已经是列市纵横，商业极为繁盛。著名的“三坊十八铺”商业街区，就分布在南门外。其次，在大东门、小东门、小西门外，也有附廓成片街区，并形成各自的区域特色，而自圆通山至大西门一线，则基本没有附廓房屋建筑，城墙外大体上还是一片山石和原野。

明城墙

从公元1382年筑砖城起到1952年开始拆卸时止，昆明的明代古城墙整整存在了550年。在这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特别是经过康熙年间的平吴战事，咸同年间的民族纷争，道光十三年的地震波及，乾隆五十五年、同治十年的大雨淫霖，城垣垛口曾多次有所损坏和坍塌，但由于明清两代对城垣修葺和维护的重视，毁坏之处大都得以修复。在清朝统治的253年间，城垣大小修理次数共达23次。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甚至推及到20世纪50年代初，除南屏街一段主动拆卸建路，以及抗战时在东、西门有几处为利于空袭疏散而挖开缺口外，昆明古城垣依然保存得相当完整，英姿不减当年。

那时候，人们依然可以从不同的角落，领略到昆明古城垣的无限风光。

当人们伫立于东北郊三五里的不远之处，举目观望，就只见那巍峨的城墙，装扮着整齐的垛口和厚实而平整的城砖，其势如一条巨大的蟠龙，蜿蜒起伏，在螺峰山腰的巨石丛中蜿蜒屹立，宛如一道磐石般的天然屏障，阻遏着一切外来的邪恶，庇护着黎民众生，景象极为雄伟壮观。而从小东门、大东门直至南门这一段，背靠着护城河，则是附廓房屋、街巷跨越盘龙江向东、南方伸展，各色建筑星罗棋布，绵延数里，直至郊外。这一片是昆明城商业繁盛之区，只见城墙内外，一片熙熙攘攘，人流、物流热闹



异常。出南门沿顺城街往西，不过半里之遥，到了街尽头，便已是郊野。这里，在高大的城墙下边，原来宽可行船的护城河，如今已变成一条清澈的小溪。沿城垣循着溪边小径信步走到小西门，沿途一派大好风光，只见流水潺潺，垂柳轻拂，花草丛生，举目则见城墙巍峨屹立，钟楼屋角高翘斜挑，一片古色古香。

城墙内侧，老昆明人称之为城根脚。从大东门城脚至小东门城脚这一段，人称东城埂脚，这是一条宽约十公尺左右的古老的泥土路。我们幼时上圆通山游玩，走的就是这条路，沿途又颇具另一番风光。路一边是古老的城垣，从城墙头到城脚是一道经夯实而倾斜的泥土山坡，长着山茅野草，城坡脚则生长着一丛丛的荃麻；另一边则是一排排七前八后，参差错落的古民宅民居，大都属于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古建筑，中途有一座门庭宽大的衙门，虽然已经很陈旧，但仍然显示出一副古代官衙的气派，这大概是明清时代一座专司水利的官署。过了衙门不远，有一座古寺，业已断了香火，颇为荒芜破败，寺僧用之作为寄栖所，寺内寄存着一些亡者的棺木，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气氛。人们走过这条路，不免会产生一种苍茫而又凄凉的感觉。

在东、南、西城墙头的一些地段，还有一道独特的景观，那就是断断续续地逶迤矗立着的一棵棵高大的桉树，老昆明人称之为“洋草果”树。据说是唐继尧主滇后，专门引进法国桉树籽种栽种的。经过一二十年的成长，业已粗实茁壮，枝繁叶茂，清风袭来，沙沙作响。一棵棵成熟而饱满的桉树种籽，散落得遍地都是。我们小时候路过城根脚，总要去拾取一堆来玩，特别喜爱闻那特异的清香。也有一些城市的贫苦人家，提着提篮，专门来拾取散落的树叶、树皮和树枝，



以弥补薪用。利用墙头荒地栽种树木，不仅绿化美化环境，还可遮风避雨，带来各种用途，这亦不失为这位唐公的一项“德政”吧。其实，只要你登上城墙头，不仅只是在高大的桉树下好乘凉，更可贵的是登高远眺，能够饱览一番城墙外边以及郊外原野的无限风光。只见护城河绕城而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虽然河道已经变窄变浅，不似当年那般可通舟楫，但河面仍然清晰可见，河水虽不很清澈，但亦不太浑浊，河中长满了一片片的水葫芦，宛如在城墙脚缠绕了一条轻柔而碧绿的带子。护城河隔岸则是一座座连片而参差错落呈人字形的屋顶，那一大片呈深灰黑色的屋瓦，似乎在向人们倾诉着那古老的历史沧桑。而如果你是在圆通山腰那一段城墙头上登高远眺，则又是另一番景色，这里已经没有附廓房屋，一眼望去，是一片无垠的绿色田野。只见田园阡陌纵横，黄绿相间，一行行树木逶迤伸延，远处群山环抱，大地显得十分宁静和安详，令人心旷神怡，豁然开朗。

城墙在古代是最主要的城防工事，到了民国，又派上了一些新的用场。1938 年后，日寇飞机频繁空袭昆明，有的富庶人家便自己掏钱于城脚挖掘防空地道避难，我有幸也去躲避过一次，只见地道挖得还很宽敞结实，可容纳二十来人，气流还不算很沉闷；地方当局也在一些地段挖掘了简易的猫耳洞，供市民使用，但后来老昆明人又似乎觉得城墙的目标还是太大，躲在下边也并不很安全，于是空袭一来大家都往城外跑，也就很少有人再钻地道了。此外，城墙每相隔一定距离，都凸出砌建一方阵形小小的瓮城，供战时屯兵之用。1948 年，我进云南大学读书时，校内上百名的工友，并无专门的宿舍，就居住在这瓮城里，我曾进去看过一次，只见里面热气腾腾，工友们的床铺七横八竖。昔日屯兵之所，已成了劳动人民栖身之地了。

城 楼

城楼是城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富于历史意义的古建筑遗迹。

昆明古城共建有六门：大东门、小东门、南门、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其中，构筑特别严谨和周密的是南门、大东门和小西门三座。这是因为这三座门外还紧连着构筑了一个方阵形的“月城”。“月城”正中出口处，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城门，这样的构筑格局，似即为古人所谓之“重关”。这大约是因为南门、大东门和小西门这三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从而强化了防御。城门和城楼本是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建筑整体。下部为门，上部为楼。但也许是在古人的心目中，城门和城楼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专门对二者分别冠以意义深邃的称谓，意在增强和丰富二者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之更加凝重。南门，故址在今南屏街西口，百货大楼与云药大厦中间。

南城，明清以来即为交通要衢，并逐渐发展成为商业繁盛之地，商贾云集，列市纵横，城门和城楼的修建也相应地更为壮丽。城门后称正义门，城楼称近日楼；月城城门则称丽正门，皆为建造较为精致的重檐楼。明初，南城即为要塞重地，其征滇之平西侯沐英曾驻节于此，并为城楼题词称：“南楼望远”。明代在城外建有忠爱、安远、金马、碧鸡四座牌坊，以壮城市观瞻，并寓风物教化之意。安远坊已不可考，忠爱坊于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毁于兵燹，光绪十年重修，后亦毁。金马、碧鸡二坊历经康熙、道光、光绪年间三次重修，颇为辉煌壮丽，光彩耀目，一直矗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不失为昆明古城具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到了清末民初，南城已是市井繁荣，交通拥挤，人流、物流往来频繁。时人描述当时的状况，称南城虽然“画栋雕梁，固壮严犹在也”，但“重门叠设，皆宽仅丈余，黝然深黑，而又络以月城，廛屋参差，露贩杂陈，市人熙来攘往，出入于其间也，肩背相摩，有如万蜂穿穴，无塞无缝之势”。唐继尧主滇后，为了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开始对南城城垣进行重点改造。首先，于 1919 年，在绣衣街（后称护国路）南端挖开一城墙缺口，新建一三股道颇为高大厚实的镂花铁质栅门，称护国门，自此，南城又多增了一道城门出口，老昆明人称之为“小南门”。另在门外跨护城河修一铁栏石桥，称护国桥，并以此二者作云南护国运动的纪念。护国门一直保留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来在修建工人文化宫时，将其拆卸装置作为文化宫大门，后不知所终。1923 年，昆明市政当局动工改造大南门，将丽正门和月城城垣同时拆除，保留近日楼而对城门重新命名为正义门，均加以修饰使之焕然一新。在城门两侧则各开缺口，沿月城旧址筑成环形马路，环形马路上新建了西式门面的商铺，中间开辟为一小型的环形花园，周边围以低矮的镂花铁栏，称近日公园。园内除植树种花，修建喷泉外，主要于园中建一大理石座之铜质标碑，上面以隶书字体镌刻：“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以标榜这位唐公的功绩。南门改造后，规模扩大，景象一新，交通趋于便利。环路两侧经营的店铺，都是市内最具实力的商家，是全市商业的“黄金宝地”，也是全市经济活动聚焦